

教育议题的博士论文田野经历

我的博士论文开题和田野做得很不一样。我开题的题目是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时间和空间变化，想用这些变化来解释为什么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入学难。但在答辩的时候，这个题目被直接否了。

否定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我在论文委员会里新请了一位政治系老师。答辩过程中，这位老师直接问我有没有关系访谈非常高级的官员。我说没有。于是，这位老师建议我做的草根一些，从家长开始做。

论文委员会的其他老师和我自己都觉得这很有道理。2017年暑假去了田野之后，我还尝试做了一下政策制定的题目。但是如前面这位老师所说，我当时明显欠缺相关能力。于是我很快把重点转移到家长上，来看家长是怎样为孩子来争取教育资源。

在这个话题下，现在我的博士论文框架里含有三个实证章节，分别是准入、选拔、退出。这三个章节是在田野里发现了三个现象，倒过来拼装出来的。目前还处于初步的写作阶段。

准入

研究中国的流动儿童入学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中国的户口制度太特殊了，而流动儿童入学其实离不开户口。这就导致除了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和不平等过程来描述，就非常难把这个现象和（西方主导的）社会学理论文献对话，这就导致对它做深入的学术研究有理论匮乏的困难。

后来我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我在浙江做一个小研究的时候，发现流动儿童入学在有些非一线城市的操作其实是在“非学区生入学”这个框架下进行的，其实流动儿童入学占用的名额和报名流程，和本地跨区择校的学生是一样的。所以当非学区生招生政策在2012-2014年前后变得严格的时候，它其实也对流动儿童入学和本地小孩择校都造成蛮大的影响。这对我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流动儿童入学和本地小孩择校这两个现象背后的政策、制度框架可能是相通的。

在北京做博士论文田野时候，又发现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北京都市区里的卫星城市中产家长不少把小孩送到北京、天津去。北京的流动儿童家长和浙江相比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浙江的家长如果在本地上不了学，就基本上得回老家了；选择周边县市的有，但是比较少听到。但是北京的流动儿童家长不一样，他们中不少人会考虑一个另外的选项，就是在河北（靠近北京的市、镇）、天津去让孩子上学，而且这个地方不是老家。

综合这些，我觉得流动儿童入学、本地小孩在本地的跨区择校、三四线城市家长送小孩到大城市上学这几个现象，可能其实是同一个故事，放在一起才能更好理解。这些看起来不同故事的背后，似乎都有共同的制度线索。

这个共同的制度线索具体是什么，现在还在探索，可能是一个非正式和正式制度交替演化的过程。早在学区制近年来落地实行之前，学校准入早就有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到来之后，非正式制度看起来消失了，但很多时候进行了转化，家庭仍然找到了各种办法进行跨区入学。这个转化中的空间和入学联系的制度安排，不仅影响流动儿童、劳工家庭的儿童入学，也影响本地的、中产家庭的入学。这样看来的话，流动儿童入学中的种种困难，是这个普遍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例子。

选拔

第二个实证章节写的是选拔。这个选拔就是我17年暑假刚在国内做田野的时候，去了几个大城市，和家长聊天。我本来是想去发现一些典型的差异，然后选择两个有代表性的地方来研究比较，但是聊下来发现各个城市的故事大同小异。比如我本来以为比较“红”的城市，重庆，它的小升初竞争出乎意料的也很激烈。倒回去看是因为它最好的初中在20多年前变成了带有民办性质，所以这些初中不再是学区招生，而是享有招生权。

这在很多大城市的现象都很类似，有例外的可能是深圳和北京的部分城区。在广州，我第一次听到了“坑班”这个词。当时访谈前一年“上岸”的家长，她给我描述的整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让我印象太深刻了。后来我发现这个现象在其他城市也有，本土词汇也大同小异。

后来，因为北京具有很丰富的生态，在全国的教育发展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就打算在北京做主要的田野。到了北京之后，因为种种原因，也觉得自己对校外辅导的生态不知道怎样去切入，后来机缘巧合进入了一家行业领先的教育公司工作了一年。

工作的体验就是校外辅导公司的确很厉害。这家公司的教研团队在2017年就号称有2000人，做技术系统支持的工程师也号称另有2000人，现在应该更多了。这当时对我是一个震撼，就是纯粹从生产教学内容的角度来说，公司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人力密度可以比学校、出版社更高。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长久来看，校外辅导公司提供的教学内容校外辅导公司有能力反过来对学校做教学内容输出，或者有能力占有更多孩子的学习时间。于是，我就想去研究校外辅导公司是怎么来的。

在做了一些田野之后，我目前理解的故事，校外辅导的公司形式需要有很高密度的超纲学习的需求——如果没有这种密度，那么校外辅导还会是像美国一样主要是个体户的形式。而这种高密度的超纲学习需求，一开始是在2000年前后开始的小升初竞争所直接产生的。而世纪之交小升初竞争的产生，有较复杂的全国和本地政策渊源，其中重要的一点是

全国许多大城市在2000年前后对公立中学体系进行了改制，赋予了优质初中制度化的招生权力。

校外辅导公司形式产生之后，围绕它产生了一个校外的教育生态。过往研究说它是“影子教育”，但它显然已经不只是影子，其中一方面就是它铺设了一条教育向上流动的新梯子，深刻影响了家长对教育策略的认知。例如，在访谈家长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中产家长主动提起来“鸡娃”。就算他们自己没有完全采取这种策略，他们也很清楚有别的家长这么做，并且各种场合中思考过自己是否也要这么做。有不少家长描述过了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这个点上发生的事件让他们决定开始让孩子去做进入竞争性的课外辅导。

在高考制度没有大变革的情况下，家庭面临的应试压力是从后往前传递的。正式的制度让这个压力从高考传递到中考。从正式制度上来说，学生在初中开始用功也来得及。但非正式制度可以让这个压力继续往前延伸，在不同情况下延伸的长度不一样——在有的情况下延伸到了小学高年级，有的小学低年级，有的更早。小升初、校外辅导、幼升小这些今天的大城市中产家长们耳熟能详的选择关口，就是这些关于选拔的非正式制度生长、演化的结果。

退出

最后一个实证章节是讲新教育学校的。这个是因为在田野过程中我想去找家长，有一种是找熟人介绍滚雪球，另一种是发现有家长NGO。当时我去找家长NGO的时候本来只是想通过她们多找一些家长和教育人士，结果发现NGO就是一群送孩子去新教育学校的家长办的。这样，我就意外地接触到新教育学校的家长们。

访谈下来有一个印象，就是一些新教育学校的理念如果放在美国，可能就是蛮主流的理念，特别是让孩子参加很多课外活动、自由探索这一部分。和照搬国际课程的国际学校不同，新教育学校可以说是在尝试在本土实践看起来是西方中产家长的理想教育方式。而且有些新教育机构的确很雄心壮志，想要改变整个教育生态的。

但是，新教育学校们到目前为止却仍然处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四十年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之下，中国的主流教育理念相当稳定？换个问法，就是如果一些家长、一些教育者想要退出本国主流的教育制度，做另外样子的教育，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这个过程里有一个蛮大的难点，是新教育学校往往随着学生年级增长，生源会出现逐渐流失。就像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意识到要送孩子去上辅导班的家长一样，有些新教育学校的家长在某一个时间点就突然意识到，孩子面临不远的升学压力。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少家长就会选择回到主流的教育体系。高企的生源流失比率，是新教育学校面临的独特挑战。

OYCF-Chow Fellowship, Blogpost
Fangsheng Zhu, fzhu@fas.harvard.edu

在这种挑战下面，新教育学校往往倾向于凸显自己的价值理念，也就是凸显了和主流教育体系的不同。这种凸显的不同，让这些学校筛选出坚持追随这些理念的家长，但是同时也推出去了许多其他家长，初步看来似乎限制了新教育理念的发展空间。

这种小众和主流之间的矛盾，是许多新生的非正式制度和组织面临的挑战，在教育领域显得特别难克服。通过去理解新教育理念落地过程中的困难，我们或许可以借由它去理解中国基础教育怎样保持了主流价值理念的稳定。

小结

感谢 OYCF-Chow Fellowship 的资助，让我得以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田野，在其中学到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中国基础教育的演变就像改革开放的故事一样，有许多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交融碰撞。在准入、选拔、退出三个领域的制度变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基础教育里一些新现象和一些旧现象的来龙去脉。

由于新冠疫情，我停留在学校进行论文写作，近期都无法再去实地展开新的访谈。如果有缘读到本文的您也是一位中国基础教育的从业者或者研究者，欢迎您联系我（邮箱：fzhu@fas.harvard.edu），希望有机会与您进行交流。非常感谢！